



JIANGDAXUE QIUSHI SHIXUE CONGSHU

江大学求是史学丛书

科举与宋代社会



SONGDAI SHEHUI

何忠礼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浙江大学求是史学丛书

科举与宋代社会

何忠礼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与宋代社会/何忠礼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浙江大学求是史学丛书)

ISBN 7-100-04494-4

I. 科… II. 何…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
文集 ②中国—古代史—宋代—文集
IV. D691.3-53 ②K2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8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系浙江大学“211 工程”二期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科 举 与 宋 代 社 会

何忠礼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494-4/K·863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34.00 元

自序

一

1962年秋天,我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有继续深造的强烈愿望,可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总是不能实现。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不久,从北京传来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那时我正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任教,听到这则消息后,除了觉得有些遗憾,并无太多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以前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年龄都要求在35周岁以下,而此时我已年近40,哪里还会有报考研究生的奢望?当年4月3日中午,我偶然从一份过时的《杭州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称报考研究生的年龄放宽到40周岁,报名时间也延迟到4月5日结束(原来截止时间是3月底)。我不觉一阵兴奋,就毫不犹豫地跑到所在区的招生办公室报了名,由于时间仓促,连报名所需的照片也是暂欠的。经过5月中旬和7月上旬的初试及复试,我被录取为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的硕士研究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这样,我荣幸地成了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徐规两位教授的学生。一年后,乐素师调往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徐师就成了我唯一的导师。徐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尤精于考据。他待人宽厚,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这在宋史界是众所周知的。他诲人不倦、甘为人

2 科举与宋代社会

梯的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对我学习和研究上关怀备至,热情扶植(毕业后也一直如此),可谓终生难忘。有时我一篇文章交上去,他就会放弃自己案头的工作,通宵达旦地帮助修改,次日便将我找去,从文章内容、结构到每个标点,都一一当面指正,这中间凝结了先生多大的心血!徐师不仅要求学生把学问做好,更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他经常教育我们:做人不可追名逐利,切忌趋时曲笔。在学习和研究上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思想境界。这些都使我深受教益,成为我后来做人和做学问的座右铭。

可是,由于大学时代的劳动和政治运动特别多,真正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少得可怜,再经过后来十几年时间的荒废,过去所学到的一点点历史知识更是变得十分生疏。因此我下定决心,要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幸亏有名师的指导,加上料理家务、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重担,全部由慈母王云霞、贤妻向幼琴两人承担。她俩婆媳关系四十年,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互相体贴,互相帮助,从未有过面红耳赤之事发生,从而极大地支持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在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几乎足不出户地徜徉在史学研究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史学的营养,努力钻研,从而提高了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能力。

研究生学习期间,通过学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典籍,我对宋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这为我后来深入研究以宋代为主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本系宋史研究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作。先是承担了《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的授课任务,我边教学边研究,不久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近二万字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此文在当时中外史学界曾引起较大反响。尔后,我又陆续发表了有关宋代科举制度与社会的论文多篇,并出版了《宋史选举志补正》一书,此书后来成了日本东洋文库以中嶋敏教授为首的“宋史选举志研究会”的指定参考书。1993年冬天,广岛大学文学部主任教授寺地遵先生还聘请我出任该校东洋史研究室的非常勤讲师,赴日本给他的研究生讲授《宋代科举制度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规先生要我给本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课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门课程很重要,它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掌握寻找史料、鉴别史料的本领,而且还可以向他们介绍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方法,可惜现在已长期没有人讲授了,希望你能将它开设起来。”当时,我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关史料学的知识更是肤浅,鉴别和利用史料的基本功也不够扎实,觉得要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恐怕有负重任,心里颇为踌躇不安,但在先生的一再鼓励下,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在徐师和研究室其他老师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这门课程的授课任务,而且结合科研,撰写了一部尚有新意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不久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8年春天,我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名教授梅原郁先生的邀请,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共同研究,研究的题目是“宋代的法制与社会”。本来,我对宋代法制史了解不多,但通过与日本学者的互相探讨,并充分利用在日本易

4 科举与宋代社会

于查阅某些罕见古籍的有利条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些许成绩。我不仅积累了不少有关法制史的珍贵史料,而且还及时完成了长达三万字的《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响》的专题报告,次年刊登于日本最有名的东洋史研究刊物——《东方学报》上。回国后,又发表了一些与该课题有关的论文。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给研究生增开了《宋史专题研究》的课程,几年后,又接受了撰写南宋史的重要课题。由于我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水平已有了较大提高,虽然任务不轻,但仍然用教学和科研互相促进的方法,一方面吸收宋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所得,较好地讲授了《宋史专题研究》这门课程,受到研究生们的欢迎。与此同时,通过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完成了《南宋史稿》的撰写任务,并先后发表了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

21世纪初,有学者就我在《南宋史稿》上关于对“绍兴和议”以及岳飞、秦桧等人的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社会上还出现了否认岳飞为民族英雄的议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有人又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并著文加以商榷,期望通过坦诚的讨论与争鸣,为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二

两宋立国320年(960—1279年),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用日本学者的话来说,是处在唐宋变革的完成阶段。宋代中央集权体制比较完备,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术

文化空前繁荣,这些都给后世带来了深远影响。对此,著名学者严复、蔡元培、陈寅恪、邓广铭等先生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如严复谓:“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集》第三册,第668页,《与熊纯如论孔孟之道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陈寅恪先生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因此,研究宋代史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更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宋代史学特别发达,仅就所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据近人初步统计,就有四亿字左右。宋代史学发达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它的国祚绵长,政事繁复,人物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为撰写史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二是赵宋统治者重视文治,对士大夫不杀少辱,使史书撰写有着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三是宋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它既扫荡了以往科举制中察举制的残余,又无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的严重弊病,这样便为文化的普及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外,雕版印刷的臻于完善,从技术上保证了当时史书的大量出版和传播。正由于此,宋代不仅史书众多,体例完整,流传到今天的也大大多于隋唐。史书中的史料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基础,史料越多,研究就越方便,可以研究的东西也就越多。

以上说的是研究宋史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但要真正取得研究成果,除了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基本的文字功底以外,正确的研究方法也非常重要。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宋史研究的体会,并

结合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我想特别强调以下三点。

首先,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对于这一点,说说容易做到难,所有的人似乎都在这样做,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尽然。因为史实是客观的存在,而人的研究,从理解到撰述,往往带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表现为先入为主、人云亦云,表现为个人感情的支配,表现为片面性或理解上的失误等方面。以先入为主来说,一些研究者,往往以前人的成说作为自己文章的基本出发点,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别人的研究成果固然要参考和吸取,但是如果自己的研究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些补充和论证,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影响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历史人物一生的表现非常复杂,不能撇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谈历史事件,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评判历史人物,而应该以史实为依据,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和公正。对正面人物,不必作锦上添花之笔,若有缺点和错误也毋庸回避;对反面人物,在充分揭露其罪行的同时,若有过优点或做过好事,也应该照述不误。总之,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事,这是研究真实历史的需要,并非撰写演义。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史料可能会有不同的记载,研究者应该正视这些记载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别,或作考证,或阐明其理由,不能只利用对自己结论有利的史料,而对相反观点的史料视而不见。片面性有时甚至比无知更可怕,人们常说的“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往往就是由片面性造成的。至于理解上的错误,有些属于水平问题,有些也是片面性看问题的结果,都应当引起注意。

其次,要学会考证史料的本领。史料不仅要丰富,而且必须正确。但史料来自形形色色的途径,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来自于好事者的缘饰,有的夹杂着个人和宗派的私利、成

见,当然更有统治者的篡改和歪曲。即使是记载亲身经历,也有“遗忘”、“偶误”等因素。所以,史实虽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却并不完全等于史实。只有经过鉴定、证明是确凿可靠的史料,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史实。这就需要我们学习一些考证的本领,以辨别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大小,力求使所得结论更具说服力,少犯违背史实的错误。

再次,文稿要反复修改。史学与文学不同,它不能夸张,不能缩小,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想当然,也不能任意褒贬,因此撰写论著不能“史”兴大发,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小心谨慎,一丝不苟。根据我的经验和教训,对文稿一定要反复修改,从内容到引文,从结构、文字到标点,力求正确完善,不留隐患。何况每次修改时的思考角度会不一样,故而容易发现问题。可以说修改一次有一次收获,修改百次有百次收获,我将这种修改称为“磨”,经常告诉学生:写完文稿,不要急着去投稿或发表,一定要反复地“磨”,“磨”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否则发表后,免不了会留下各种遗憾。这一点看似技术问题,对做学问来说实在也很重要。

此外,宋代的科举制度对宋代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它不仅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而且是繁荣昌盛的宋代文化的重大推动力,与知识分子地位的升降乃至“社会流动”也有密切关系,其对当时社会影响力之大,可以说超过了今天的中考、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因此,我们在研究宋代史时,不应该对它等闲视之,而必须多加留意。有关内容本书已有所论述,此处不赘言。

三

20 多年来,我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此次限于字数,挑选了其中的 33 篇,结集出版。从内容来看,大体可分科举与社会、南宋前期的政治与军事、经济、吏治与法制、人物与思想、史料与考证、学术争鸣等七类。因为有关科举与社会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一,故将本书取名为《科举与宋代社会》。

第一类,科举与社会方面共 11 篇。《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撰于研究生学习期间,也是我首次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在考察了历史上的各种选举制度,尤其是对比了察举制和科举制这两种取士制度以后,不同意某些学者关于科举“就是分科举人”的制度这一说法,认为科举制与以往选举制度最大的区别在于实行“投牒自进”。所谓科举,当是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以考试成绩好坏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且士人定期赴试的选举制度。根据这一标准,科举制的正式形成当在李唐而不是在隋炀帝时候。《宋代省试制度述略》和《宋代殿试制度述略》二文,是对宋代这两级重要科举考试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论科举制度与宋学的勃兴》二文,主要阐述了科举制度对宋代文化及学术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与冗官冗吏的关系》一文,着重研究了北宋与唐代相比所以极大地增加取士人数的各种内外原因,通过分析比较,认为造成宋代官吏冗滥的主要原因不是科举而是恩荫,并对多为人诟病的特奏名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评价。《荐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优劣之比较——以宋代

官员的选拔为中心》一文,通过对这两种选举制度利弊的分析比较,认为包括科举在内的考试制度,相对而言是历史上最好的一种选举制度。《略论宋代的明经科》一文,研究了长期为人们所忽视和易于与诸科相混淆的宋代明经科开设的原因、时间、考试内容和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状元、榜眼、探花名称探源》、《宋代进士甲第考》、《〈宋史〉立传人物登科年代证误》三文,主要是对与科举有关的一些制度和《宋史》某些列传人物登科时间的错误记载,作了考证和辨析。

第二类,南宋前期的政治与军事方面共6篇。《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一文,研究了造成南宋初年游寇众多的原因、它的危害性和平定游寇的经过。《“兀术遗桧书”说考辨》一文,通过考证所谓兀术给秦桧信中有“必杀飞,而后和可成也”、“且杀吾婿”等内容,认为此信全为子虚乌有,是岳珂出于孝子慈孙之心,根据道听途说甚至杜撰而成,不足凭信。此文是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曾得到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和徐规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时间虽已过去25年之久,我对两位先生的帮助依然深怀感激之情。《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文,主要通过宋代“压抑武人”这一祖宗家法的分析,并具体研究了宋高宗和岳飞两人矛盾发展的经过,指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高宗,秦桧则是一个最重要的帮凶。《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一文,通过考证韦氏的真实年龄,指出高宗所以要为其生母虚长十岁年龄,目的是为了掩盖她被俘北去期间下嫁金朝奴隶主贵族和生有二子的“秽闻”。由此不仅使钦宗等人不能南归,也给南宋初年的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南宋政治》一文,主要是研究了秦桧集团的形成经过及其危害,指出由于宋高

宗、秦桧集团的腐朽统治,南宋不仅没有利用以沉重代价换来的和平局面,壮大国力,以恢复中原失地,而是文恬武嬉,继续执行迫害抗战派的罪恶政策,使国家变得更加弱小,从而再次给南宋造成巨大的危机。《宋高宗的“禅位”及其对南宋政治的影响》一文,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高宗在生前就将帝位传给赵昀(孝宗)的原因,并分析了由此对南宋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类,经济方面共3篇。《关于北宋前期的粮价》一文,透过众多史实,否定了关于北宋前期粮价低廉、“斗米不过十钱”的说法。认为粮价问题十分复杂。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和土质等条件下,它的差别很大,因而不能一概而论,就总体粮价而言,北宋中期粮价远未如此低廉。《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一文,旨在纠正以为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是全家一天生活费的误解,并否定所谓元丰年间(1078—1085年)黄州物价非常低廉的观点。《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一文,以具体史料为基础,论证了宋代户部统计的人口数,既非全体人口,亦非男口,而是丁口,即成丁之口,由此推断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的全国人口数,约为一亿至一亿二千万左右。

第四类,吏治与法制方面共2篇。《宋代官吏的俸禄》一文,通过对宋代各级官吏的俸禄状况和生活状况的比较,认为清人赵翼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一语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论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响——由〈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一文,通过对南宋“名公”们所作判词的分析 and 研究,指出南宋有法制而没有法制观念的种种事实。由于刑政不明,使社会更加黑暗腐败,从而加剧了南宋的阶级矛盾。

第五类,人物与思想方面共6篇。《也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

因——纪念王安石(1021—1086年)逝世900周年》一文,对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由于宋神宗秉承祖宗家法,采取“异论相搅”的统治策略,对以司马光为首一批有“定策功”的元老重臣姑息重用,为反对派树立了一面“赤帜”,以及在变法过程中“非其人急而成之”,当为造成此次变法失败的两个重要原因。《南宋名臣崔与之述论》一文,通过对崔与之一生的研究,论述了他德才兼备、关心民瘼、淡泊名利和不入道学宗派的优良品质,认为他是南宋中期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位名臣。《文天祥爱国思想探源》一文,论述了文天祥以国家和民族为己任,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抗元事迹,深入探讨了文天祥气节凛然的爱国思想形成的原因。《贾似道与鄂州之战》一文,对南宋末年轻相贾似道在宋蒙鄂州之战中的表现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有鄂州议和,但无鄂州和议。《论宋学的产生和衰落》一文,较全面地论述了宋学产生的原因和宋学各派,认为从理宗朝起,理学一尊地位的确立,是造成宋学衰落的根本原因。《从〈齐东野语〉一书看周密的反理学倾向》一文,通过对南宋末年学者周密所著《齐东野语》一书的研究,充分肯定了该书对研究南宋史的史料价值,从中也反映了著者极为宝贵的反理学思想。

第六类,史料与考证方面共2篇。《史料论略》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史料的性质、分类和特点,强调了鉴别史料的重要性。《略论历史上的避讳》一文,主要研究了避讳的起源、演变以及各种避讳方法,并通过具体事例,说明避讳既给史实带来了损害,也可利用它来作为鉴别史料的一种手段。

第七类,学术争鸣方面共3篇。《史学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评〈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

论——兼与王曾瑜先生商榷》、《实事求是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也论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三文，就绍兴和议、建炎四年（1130年）冬天秦桧归宋问题以及对岳飞、文天祥和其他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作了一些澄清或提出了商榷意见。

上述论文的结集出版，是笔者学术成果的一个大致检阅，正可借此机会多听取师友和读者的批评、帮助，以使自己在今后的史学研究中，少犯一点错误，多出一点成果。

各篇文字，基本上保持了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只在个别地方稍作补正。正由于此，在内容互有联系的文章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重复，所引用的史书版本，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兼与王曾瑜先生商榷》一文，是我与博士研究生何兆泉同学共撰；《贾似道与鄂州之战》一文，是我与博士研究生郑瑾同学共撰；《宋高宗的“禅位”及其对南宋政治的影响》一文，是我与博士研究生邢舒绪同学共撰。这些都有必要加以说明。郑瑾同学十分辛苦地帮我扫描文章，何兆泉、周方高同学帮我核对了部分史料，长期从事出版社编辑工作的妻子更是一如既往地为我抄写和校对文稿，并不时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何忠礼

2004年6月26日

于杭州凤起苑寓所

目 录

自序·····	1
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	1
宋代省试制度述略·····	24
宋代殿试制度述略·····	44
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67
论科举制度与宋学的勃兴·····	96
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与冗官冗吏的关系·····	115
荐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优劣之比较——以宋代官员的选拔 为中心·····	136
略论宋代的明经科·····	156
状元、榜眼、探花名称探源·····	169
宋代进士甲第考·····	187
《宋史》立传人物登科年代证误·····	193
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	208
“兀术遗桧书”说考辨·····	220
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	228
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	253
“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南宋政治·····	276

2 科举与宋代社会

宋高宗的“禅位”及其对南宋政治的影响·····	291
关于北宋前期的粮价·····	304
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	321
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	338
宋代官吏的俸禄·····	365
论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响——由《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	388
也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纪念王安石(1021—1086年)逝世 900 周年·····	431
南宋名臣崔与之述论·····	455
文天祥爱国思想探源·····	472
贾似道与鄂州之战·····	490
论宋学的产生和衰落·····	510
从《齐东野语》一书看周密的反理学倾向·····	536
史料论略·····	558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583
史学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评《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	598
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兼与王曾瑜先生商榷·····	616
实事求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也论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633